



文艺学系列教材

西方文论教程

(第二版)

张玉能 主编

文
博
雅

华
中
师
大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文论教程

(第二版)

主编 张玉能

副主编 张弓 李显杰

编写 (以章节先后为序)

张玉能 徐正非 李定清

柏定国 张弓 李劲松

贺常颖 郑安云 李俊

李天喜 聂运伟 李显杰

彭萍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论教程(第二版)/张玉能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622-4557-5

I. ①西… II. ①张… III. ①文学思想史—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4085 号

西方文论教程

(第二版)

© 张玉能 主编

责任编辑:谢 琴

责任校对:方汉交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高校教材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海军工程学院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522 千字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28.25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2 版

印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35.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新版总序

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的教材建设,起步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1958年编写的教材,突出若干政治倾向鲜明的文艺观念,打上了颇浓的当时环境的印痕,显得有些粗糙。六十年代初期,各位主讲教师逐年修订,加强了文学基本知识的介绍。到了1989年,孙子威教授主编的《文学原理》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总结了主编本人和他带领的团队长期研究的成果。同时,王先霈、范明华撰著的《文学评论教程》于1986年出版,并在1988年被国家教委定为高校文科教材。到了九十年代末,新世纪将要来临之时,适应新的需要,在集体进行多年教学研究的基础上,作为教育部重点课题“文艺学课程体系的改革研究”的成果,出版了文艺学系列教材三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原理》、《文学文本解读》)。以后这套教材的品种陆续增加,并邀请外校教师参加编写,迄今达到九种,都曾多次重印,有的还出了修订本。新增加的教材,都是主编和参与者多年研究和教学心得的结晶,比如,张玉能的美学研究,胡亚敏的比较文学研究,孙文宪的现代西方文论研究,李建中的古代文论研究,都有诸多成果,并获广泛好评。

我们的文学理论教材,它所阐述的文学观念主要有三个源头:一是对几千年中外文学现象的概括,从文学现象的实际中经过科学的抽象提炼出来;二是对几千年中外文学理论有选择地继承、扬弃,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刘勰的理论的继承和借鉴,直到对别林斯基、德里达、梁启超、王国维的继承和借鉴;三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推导,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阐发。我们是以进入文学史的文学经典为主要根据,主要讲适用于历史和现实一般情况的基本规律。放弃这个,把文学理论教学变成讨论当前热点的讲座,并不适宜。但我们讲的基本规律,要能帮助学生观察当前文学,而当前的文学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我们意识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文学理论教学曾经基本上是讲比较单一的文学观念。到现在,我们处在多种文学理论的众声喧哗之中,再也没有可能无视其他文学理论体系的存在了。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1948年第一版序中说:“我们既不像德国人那样折衷,也不像俄国人那样教条。”他们的编写原则是:“在研究中听取国际上各种

不同的意见,提出恰当的问题,提供方法上的基本原则。”我们比之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也有更明确的原则来引导学习者作出自己的判断。

文学理论教材有理论体系和叙述体系,叙述体系必须以理论体系为支撑,教材编撰者没有系统的文学理论观念,教材会是支离破碎的,把理论体系现成地搬到教材之中,却不见得符合本科学生的接受心理。理论体系体现教材编者的见解,不同学派有不同的体系——有不同的逻辑起点,有不同的基本命题,有不同的范畴概念,很难平行介绍。理论体系必须符合理论逻辑,叙述体系则要由易而难、由浅而深、由感性而理性,要打破理论体系的结构另行处理。我们的教材,重叙述体系,重现象,重知识,重实际,围绕理论问题介绍历来和当前主要的观点,把若干学派的观点打散后纳入教材的叙述体系之中,努力使我们的教材和教学既是系统的,又是丰富多样的。

教材的叙述体系要考虑到学生接受的思维特点,考虑由具体到抽象的循序渐进。例如,《文学理论》一头一尾讲文学的基本性质,中间讲文本,讲创作和接受。我们认为,对于本科学生教材的论述不宜太抽象,要多联系具体文学现象来讨论,主要给学生方法和知识。一本教材要有一个完整的叙述体系,这一套教材也追求一个大的体系。

教材建设是没有止境的,教材撰写总是一种遗憾的工作——一本教材刚刚出版,新的观念、新的思路又产生了。诚恳地期望使用者、读者提出意见。

王先霈

2006年12月15日

第二版序言：论西方文论的研究型教学

目前，研究型教学在中国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之中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关键词，是当前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一个热门话题和前沿话题。但是，对于究竟是什么研究型教学，大家的理解和意见却并不一致，而且，许多高校教师都在进行着对此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我们也想结合西方文论的教学来谈谈研究型教学，希望能够通过同行们的切磋和探讨，逐步达到某种相对的统一认识，以利于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

一、何谓研究型教学？

所谓研究型教学就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的教学，其核心就是培养学生的元典精神、质疑精神、创新精神，教会学生进行研究的方法。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的想法是，人们的研究工作应该是围绕着“问题”展开和进行的。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科学研究说到底也就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我们的研究型教学，也就是要培养和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只有让学生通过教师指导下的学习，真正学会了发现本专业的主要问题，能够分析这些问题的方方面面，并且最后给予这些问题一个比较合理和比较完善的解决方案，乃至在实践中解决了问题，这样才能够说是一种研究型教学。如果只是通过学习让学生记住了一些知识点，记住了一些现成的问题答案，然而面对着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却一筹莫展，那就是没有使学生学会研究，也就不能够称之为所谓的“研究型教学”。比如说，我们的西方文论教学，仅仅是让学生知道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但丁、卡斯特尔维屈罗、布瓦罗、卢梭、狄德罗、莱辛、赫尔德、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泰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托多罗夫、什克洛夫斯基、巴赫金、马尔库塞等文论家及其文论观点，学生却不能理解这些文论观点和文论体系的来龙去脉，更不能运用这些文论观点和文论体系去解释过去和现在的相关文

学艺术现象,那么我们的教学就不是研究型教学,只能够称之为“记忆型教学”或者“应试型教学”。

这样说来,研究型教学应该是以问题为中心,以培养和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为旨归。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一贯认为必须提倡“三种精神”:元典精神、质疑精神、创新精神。

所谓“元典精神”就是要引导学生到历代中外伟大文论家的经典原著中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且批判吸收经典原著的合理的思想、观点、理论、学说,以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理论、学说。我们认为,这是思考问题、著书立说、解决问题的根本和基础。因为我们今天要解决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问题,就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这样既可以避免无谓的重复劳动,又可以找到思考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和钥匙。我们不能毫无依据地胡思乱想,也不能一厢情愿地天马行空,而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探讨和借鉴,这就必须借助于元典。西方文论的学习和研究尤其应该注意研读原著,最好能够研读西方语言的原著。

所谓“质疑精神”就是对于每一个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每一种历代中外伟大文论家的思想、观点、理论、学说都不盲从迷信,都要质疑,对它们问一个“为什么”。只有经过了这样的反思过程,所理解、把握的文艺理论问题才是真正属于学生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硬塞给学生的,那才可能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地理空间之中的具体的思想、观点、理论、学说,而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洞抽象的虚无。西方文论的学习和研究必须结合具体历史来进行考察,问一个“为什么”,否则就只能隔靴搔痒。

所谓“创新精神”就是在元典精神和质疑精神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于每一个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的思想、观点、理论、学说,在前人的基础上有前进,有发现,有创建,哪怕是一点点的前进、发现、创建,总比死记硬背、墨守成规、止步不前、重复前人、无所作为的学习要强得多。而且,具有了这种创新精神,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就可以真正地落到实处,可以使学生学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不仅在西方文论学科的学习中,而且在其他的许多相关学科和相关问题的学习中都具有这种创新的精神和意识。这对于纠正青年学生那种喜新厌旧、崇洋媚外的不良情绪,真正树立起推陈出新、求实创新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

有了这样“三种精神”,还应该教会学生进行研究的方法。所谓研究方法就是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手段、途径和方式。我们认为,在传授西方文论的研究方法时,一般地说来应该区分方法的三个层次,并且把元方法、学科方法、具体方法这样三个层次的方法综合起来运用。所谓元方法就是关于方法的方法,或者说形而上层面的方法。在元方法层次上,我们提倡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因

为西方文论作为一种人文科学,它必须把文学艺术和文学理论的现象和问题还原到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之中来进行思考、分析和解决,离开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实条件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所谓学科方法就是运用某一门科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基本形式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比如,我们运用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基本形式来发现西方文论问题,分析西方文论问题,解决西方文论问题,这些就是西方文论研究的心理学方法层次。现在,西方文论研究之中广泛运用了人类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符号学方法、文化学方法、信息论方法、控制论方法、系统论方法等。所谓具体方法就是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所采用的一些具体的、实在的手段、途径、方式,比如实验法、对比法、观察法、内省法、问卷调查法等。这些具体方法在西方文论研究之中也是被广泛运用的,特别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西方文论产生了由“形而上”转向“形而下”的研究转向以后,这些科学的具体方法就代替了西方古代传统的单一形而上的思辨方法,而把自然科学的许许多多具体方法运用到人文科学的西方文论研究之中,产生了所谓的“科学主义思潮”。这三个层次的方法应该统一起来综合运用才可能真正科学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这样的三个层次方法的综合运用才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圆其说,成为真正的科学的研究。

二、西方文论的研究型教学

在西方文论的教学中,研究型教学应该以西方文论的经典原著为根据,梳理西方文论的关键问题,分析西方文论发展的问题转换,分清西方文论各种流派的利弊得失,审视西方文论解决中国文艺问题的可行性和适应性,鼓励学生把西方文论作为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的参照系,做到“洋为中用”,发展中国当代文论。

首先,西方文论的经典原著应该是西方文论研究型教学的根据。从历史的经验来看,1962年—1964年的教学改革之中,西方文论的教学被提上了高等院校文科教学的日程。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复旦大学伍蠡甫先生受教育部的委托编辑了《西方文论选》。新时期伊始,为了进一步改进西方文论的教学,1978年伍蠡甫先生对《西方文论选》进行了修订,1983年又编辑出版了《现代西方文论选》(均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4年,伍蠡甫和胡经之又编辑了《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中、下)三大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随着时代的发展,王逢振、盛宁、李自修等选编了《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这些最基本的工作保证了西方文论教学的进行,也使得学习和研究西方文论的师生有了基本资料的保障。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许多欧美国家的西方文论研究型教学就是以各种相关资料为

基本教材的,例如,英国著名文论家拉曼·塞尔登选编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就是1988年以来英国乃至欧美许多高校文学理论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它以西方文论的关键问题(关键词)为经,以历史发展过程为纬,全面地选编了西方文论的基本资料,给西方文论研究型教学的进行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为了进行西方文论研究型教学,就必须让学生主动地阅读、研习类似的基本资料,否则就会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现象,而且也可以杜绝学生只知道一般西方文论教材的一些论点、知识点,却不知道它们出自何处,不知道具体的上下文(语境),甚至出现不知道西方文论名著的篇名、作者等怪现象。

其次,明确西方文论的关键问题,明了西方文论发展的问题转换是西方文论研究型教学的重中之重、焦点所在。如上所述,研究型教学也就是围绕问题展开的教学,是为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的教学,那么,从古到今西方文论的关键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转换的情况就是我们在教学之中必须做到心中有数的,且在本课程教学结束之后学生也必须了然于心。因此,以问题为中心组织教学,讲清楚这些关键问题的来龙去脉、起承转合就是西方文论研究型教学的中心环节。这个方面恰恰是我们过去的西方文论教学的一个弱点。以前我们往往以文论家和文论流派为中心,以历史发展过程为线索来组织教学。这样虽然可以记住文论家、文论流派的主要观点、主要理论,但却助长了学生的死记硬背之风,而不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像拉曼·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的引进、翻译、出版,对我们的西方文论研究型教学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可以看到,按照塞尔登的归纳,西方文论的关键词和关键问题就是: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然后下面再细分一些小问题。这种划分是可以参考的。不过,我们也可以按照文学理论的大致构成来组织问题,比如按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欣赏论、文学批评论、文学形式论、文学风格论、文学思潮论等来组织。比如,文学本质论中,我们可以抓住古代的模仿再现说(古希腊罗马的模仿说——文艺复兴的镜子说——现实主义的再现说),到现代的情感表现说(列夫·托尔斯泰的情感交流说——浪漫主义的情感想象说——克罗齐的直觉说——苏珊·朗格的情感符号形式说),再到现代的文本形式说(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说——英美形式主义的有意味的形式说——结构主义的深层结构说),再到后现代主义形形色色的反本质主义的无本质说(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说——德里达的文本不确定性说),来进行研读和讲授。如果能够在教学中做到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以历史发展为经,以关键问题为纬,就可以有效地培养和提

高学生对于诸如文学的本质等关键词和关键问题的发现、分析、解决的能力和水平。

再次，辨明西方文论各家各派的利弊得失，以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是西方文论研究型教学的根本。西方文论史上各家各派的文论思想、文论观点都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产物，因此它们既有其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但又必然会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在西方文论的研究型教学中，就必须让学生辨明、分清西方文论史上各家各派的得失利弊，最后还要落实到“洋为中用”，即为建设中国特色当代文论服务，把西方文论史上的各家各派的理论观点作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当代文论的参照系，吸取其合理的、有益的部分，剔除其过时的、有害的部分，使学生养成一种学以致用的学习和研究的习惯。

三、研究型教学的多种形式

在西方文论研究型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许多行之有效形式，真正把西方文论研究型教学落实到每一个教学环节。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课前的西方文论原著的阅读、研习。

第二，课堂教学之中的讲述、讨论与批评实践等相结合。

第三，将课外学习小组、学术讲座、西方文论小论文写作、文学批评论文写作等多种方式结合起来。

在这些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之中应该突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落实，从而使得学生能够真正学会研究方法，把不同层次的方法（元方法、学科方法、具体方法）综合运用，在实践中学会阅读原著，研习原著，针对西方文论的基本问题和关键问题进行思考、分析，最终能够解决问题，不仅能够准确地评价西方文论史上的各家各派理论观点，而且能够灵活运用西方文论的观点和方法来发现、分析、解决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文学艺术现象中的相关问题。

当然要真正搞好西方文论研究型教学，必须在教学实践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脚踏实地地抓好每一个教学环节，实实在在地教学相长，有成效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张玉能

目 录

导言：西方文论的发展及其规律	(1)
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文论	(8)
第一节 概况	(8)
第二节 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	(12)
第三节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17)
第四节 贺拉斯的《诗艺》	(25)
第五节 朗吉弩斯的《论崇高》	(31)
第六节 普罗提诺的文论	(37)
第二章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论	(42)
第一节 概况	(42)
第二节 奥古斯丁的文论	(46)
第三节 托马斯·阿奎那的文论	(49)
第四节 但丁的文论	(54)
第五节 达·芬奇的文论	(59)
第六节 今古之争	(63)
第七节 卜迦丘和培根的诗论	(67)
第八节 卡斯特尔维屈罗与锡德尼的诗论	(70)
第三章 新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文论	(75)
第一节 概况	(75)
第二节 第二次“古今之争”	(78)
第三节 布瓦罗的《诗的艺术》	(80)
第四节 法国启蒙主义文论	(82)
第五节 德国启蒙主义文论	(91)

第六节 英国启蒙主义文论	(98)
第七节 意大利启蒙主义文论	(103)
第四章 德国古典美学的文论	(107)
第一节 概况	(107)
第二节 康德的文论	(108)
第三节 歌德的文论	(113)
第四节 席勒的文论	(118)
第五节 黑格尔的文论	(124)
第五章 浪漫主义文论	(133)
第一节 概况	(133)
第二节 德国浪漫主义文论	(134)
第三节 英国浪漫主义文论	(139)
第四节 法国浪漫主义文论	(146)
第六章 现实主义文论	(158)
第一节 概况	(158)
第二节 法国现实主义文论	(160)
第三节 英国现实主义文论	(170)
第四节 俄国现实主义文论	(174)
第七章 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文论	(199)
第一节 概况	(199)
第二节 泰纳的实证主义文论	(201)
第三节 左拉的自然主义文论	(207)
第四节 阿诺德的人生批评论	(214)
第五节 勃兰兑斯的文论	(221)
第八章 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和印象主义文论	(229)
第一节 概况	(229)
第二节 波德莱尔的“纯艺术”文论	(233)
第三节 马拉美的象征诗论	(238)
第四节 法朗士的印象主义批评论	(241)
第五节 布拉德雷的“纯粹诗”论	(245)
第六节 佩特的“纯粹美”文论	(248)

第七节 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文论	(251)
第九章 现代主义文论	(256)
第一节 概况	(256)
第二节 非理性主义文论:意志主义文论、直觉主义文论	(261)
第三节 心理学文论:精神分析文论、分析心理学文论、移情说、距离说	(274)
第四节 科学主义文论	(294)
第五节 人本主义文论	(326)
第十章 后现代主义文论	(369)
第一节 概况	(369)
第二节 利奥塔的后现代叙事论	(372)
第三节 福柯的话语·知识·权力说	(378)
第四节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文论	(388)
第五节 德·曼的解构修辞学	(395)
第六节 欲望美学文论	(400)
第七节 文学场论文论	(408)
第八节 女性主义文论	(422)
第九节 后现代主义文论的特征及局限	(431)
后记	(437)
第二版后记	(438)

导言：西方文论的发展及其规律

所谓西方文论是指以欧洲为主体的、包括北美的广大地区的文学艺术的理论，是一个与东方文论相对举的概念。它以欧洲的文学理论为主，也兼及一部分有关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的理论形态。

西方文论，一般说来是以西方哲学为基础，通过西方美学，与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因此，西方文论的发展，必然是以西方哲学和西方美学的演变为其基础，又以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为根据的，同时还与整个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这就规定了西方文论的发展，既不可能远离西方社会的历史变迁，也不可能脱离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艺术的具体演化嬗变。然而，我们过去却由于长期受机械唯物论和教条主义的影响，注重于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在西方文论的研究中往往产生了庸俗社会学的和简单化的错误，致使西方文论的具体发展变化的规律未能得到如实的、细致的揭示，往往成为社会历史一般发展规律的概念化图解。新时期以来中国对于西方文论的研究也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而逐步达到了注重实事求是的境界，这对我们揭示西方文论的发展及其规律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西方文论的发展一般说来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大的阶段：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主义文论（公元前 6 世纪—公元 5 世纪）——中世纪神秘主义文论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论（公元 5 世纪—16 世纪）——新古典主义文论和启蒙主义文论（17 世纪—18 世纪）——德国古典美学的文论（18 世纪末—19 世纪中期）——19 世纪的浪漫主义文论、现实主义文论、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文论、唯美主义和印象主义文论——现代主义文论（20 世纪初—20 世纪 50 年代）——后现代主义文论（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

西方文论的发展首先是受着西方社会的发展的制约。西方文论之源当然主要在古希腊。古希腊以商品经济为主的奴隶制社会给整个社会的文明注入了向外求真的科学精神，也就使古希腊的文论铸就了整个西方文论的向外求真的品格。因此，在文艺的本质上就流行摹仿说，而在伯利克里时代（公元前 5 世纪）所形成的柏

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论就围绕着文艺的真实性问题展开争论,而且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正式创建西方文论学科开始,真实性问题始终成了一个中心问题。直到19世纪以后西方社会的转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这种态势才有所改变,但是,从深层上看,文艺的真实性问题依然是个挥之难去的幽灵,像海德格尔这样的由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大师在文论思想上仍然离不开真实(真理)的问题。

西方文论的另一个源头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统治下的欧洲封建社会的神学思想(创世说、原罪说、来世说、赎罪说)与封建的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相结合,给西方文论融入了一种形而上学精神,把一切归于唯一的源泉——上帝及其人间的代理(帝王)或者某一个客观的精神实体。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论就在中世纪的早期和后期分别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此,由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主义转向神秘主义,并且直到19世纪中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成为西方文论的两大主潮,都渗透着形而上学精神和宗教性的追寻。而20世纪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恰恰就是从反对这种形而上学和宗教性情结,走向日常生活世界和不确定的观念,西方文论也逐步走向多元化、世俗化、平民化。

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逐步兴起,人和自然成为西方文论的中心,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得到同时并举的发展,因此,艺术摹仿论转换为艺术镜子说,科学化的文艺理论流行,绘画中的透视理论、人体解剖学、色彩理论,文学中的俗语运用和各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以及文学文体和形式的被重视等都反映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对古希腊文论的继承和发展。从20世纪开始对形式、文体、语言的高度重视所形成的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转向的各种文论,应该说都与文艺复兴的西方文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17世纪和18世纪是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17世纪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妥协所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体的最后兴旺形成了新古典主义文艺的繁荣,同时造就了理性主义和规范化的新古典主义文论。这种文论把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主义文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古典主义文论加以理性化、条理化、规范化,最终导致了古典主义文论的僵化。随着反封建斗争的展开,启蒙主义文论也随之兴起,要求打破新古典主义文论的僵化,孕育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文艺思潮及其文论。启蒙主义文论充满着矛盾斗争,不仅有反对新古典主义的斗争,还有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的矛盾冲突。这种现实冲突的反映最终在德国古典哲学、美学和文论之中得到了调和。

德国古典哲学、美学和文论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德国社会的产物,充分显示了德国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以精神的、理论的形态对待法国大革命和整个欧洲

大动荡的既爱又怕的心态。因此,它一方面充满了调和理性和感性等矛盾的意向,另一方面又构筑了以唯心主义为主流的康德、席勒、歌德、黑格尔的体系,同时,它也达到了古典形态文论的最高峰,当然也孕育着对古典形态进行现代突破的契机。这样就必然地于 19 世纪中期在继承和反对以黑格尔的体系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美学、文论的基础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美学和文论。

马克思主义文论是整个社会及其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革命性变革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价值论)或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给西方文论确立了崭新的发展方向,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文艺和文论方面确定了地位,同时也对整个西方文论,特别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自身也不断地与时俱进,产生了具有各种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论,既是俄国社会革命的一面镜子,又是对德国古典美学文论的批判和继承,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是以批判黑格尔为出发点,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是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唯物主义美学和文论的继承者,他们都以当时俄国的文学艺术上的批判现实主义为依托,充分发展和发挥了现实主义文论,并对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论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西方现代主义文论是 20 世纪上半叶社会走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产物,也是 19 世纪西方文艺和文论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潮的发展态势的进一步发展。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危机,人的异化状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和斗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都在西方现代主义文论之中反映出来,其表现形态林林总总、千姿百态,但又可大致归结为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它从总体上以反传统、非理性、重形式为主要特征,为后现代主义的进一步反传统和语言学转向作了准备。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或叫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兴起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产生了相应的后现代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进一步反对古典的传统,否定“宏大叙事”,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突出差异性、个别性、不确定性,反映了社会生活及其文艺的多元发展和不确定意义。后现代主义文论主要表现为存在主义、解释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复杂的多元共存的形态。

西方文论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制约,而且更直接地受到哲学和美学的影响。

从哲学的发展大趋势来看,从公元前 6 世纪古希腊哲学开始直到 16 世纪文艺

复兴结束,哲学以探讨世界(宇宙)的本原和本体为主,形成了所谓自然本体论哲学,在这个哲学基础之上产生了自然本体论的美学和文论。它以探讨客体的存在及其根据为主,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在文论上就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念论的影子真实论与四因论的摹仿真实论的相互对立和相互交替为主要线索,经过了古希腊罗马古典主义、中世纪神秘主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新古典主义等具体发展阶段。

16世纪至17世纪之交,自然本体论遭到了怀疑,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哲学家怀疑人类认识自然本体的能力,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口号,把自然本体论的基础移到了认识论的基础之上,产生了哲学上的“认识论转向”,认识论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和基础。这个转向过程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的康德哲学,到黑格尔哲学中形成了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相统一的哲学体系,达到了西方古典哲学的高峰。认识论哲学又滋生出认识论的美学和文论,它们以人的主体及其认识(包括某些心理)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文论上就把古希腊自然本体论的摹仿说转化为认识论的镜子说和再现说,为现实主义文艺和文论乃至自然主义文艺和文论的发展奠定了哲学和美学基础。作家的生平研究,审美欣赏的某些心理因素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具体,无论是大陆理性派和英国经验派,抑或德国古典美学,都对文艺的主体日益加强了重视,想象和天才的研究得到了大力张扬,对浪漫主义文艺和文论的发生发展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西方的哲学由认识论向社会本体论转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自称为“实践唯物主义者”,创立了实践本体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继承费尔巴哈的人类学本体论。西方现代主义者们则以各种人类精神为本体,创立了唯意志主义、直觉主义、生命哲学等精神本体论。精神本体论的美学和文论则高扬意志(叔本华、尼采)、直觉(柏格森、克罗齐)、生命(伏尔泰、奥伊肯)、情感(科林伍德、苏珊·朗格)、无意识(弗洛伊德、荣格),以这些人类精神来界定文艺的本质、特征和构成等重大问题,并总结了现代主义各种文艺思潮,也推动了这些思潮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论以表现说代替再现论(摹仿说),以生命和意识的本体或者形式的本体代替认识的主体性研究,形成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马克思主义文论由于与西方现代主义文论的对立,反而独立地强调反映论文论,却又导致某些由政治影响带来的动荡。

20世纪60年代以后,哲学上产生了“语言学转向”,从分析哲学(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中产生了语言本体论思想,诸如,“语言是认识的边界”(维特根斯坦),“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语言是被理解的存在”(伽达默尔)等命题广泛流传,文本和意义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文学和叙事成为哲学